



《印象一九四二》

1941年夏天，干旱豫北，河南100多个县受灾。到了1942年春仍持续干旱，夏粮无望，秋粮绝收，河南上千万人陷入饥荒。

据说《河南大事记稿》，1942年，河南全省人口3000万人，饿死300万流人，逃亡他省300万人，濒于死亡等待救济者1500万人。

1942年无疑是不平凡的一年，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血战……几十年之后，这些名字人们依旧耳熟能详。但与这些被绘声绘色记录和细致入微描绘的历史片段相比，70年前中国土地上发生的惨痛历史，在当今各种版本的中国近现代史书籍中，竟难以找到应有的记载。

冯小刚：

1942年，是抗日战争的转折点。

但是，它还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在这一年，河南在1942年的秋天因为一场旱灾，发生了吃饭的问题，大家开始在饥饿线上挣扎。农民连口粮都没有了，但是因为作战的需要，政府还要征很多军粮，这让河南人雪上加霜。

所以我的印象就是1942年这一年，抗日战争打得最惨烈，另外就是河南发生了一场旱灾。

刘震云：

1942年的社会环境，有很多层面。那时中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那时，国民政府正在应对战争，跟旱灾比起来，政府会更注重应对战争。

所以当河南发生旱灾的时候，蒋介石没有把河南旱灾当成一个需要用重大决策和措施来应对的事件。更巧的是，政府无力救灾，而日本军队已经包围了河南。在这种局面下，不少灾民开始往陕西逃荒。

张国立：

好像也知道一些关于河南的灾害的事情，知道蒋介石炸花园口、知道豫北战役。但是这些支离破碎的元素没有一次被“顺”下来。

冯远征：

对1942年没什么印象，除了拍戏接触的以外，其他几乎是没有。但是大的历史背景还是知道的。

张涵予：

好像很遥远又很近。自己本身没有体验过，对天灾的理解，人是很无助，人还是要顺应自然。

李雪健：

我的老家在山东菏泽，虽然我是1954年生的，这个事情发生在1942年，但是电影的这个发生地天津自然灾害，小时候是听说过的。那个时候分两路，一路是闯关东，一路是走西口。有一阵自然灾害，我还在农村，是那时听到的闯关东、奔西口的这些故事。那也是我也就七八岁。

《票房之争》

《一九四二》、《王的盛宴》票房之战烧至分账

冯小刚导演的《一九四二》与陆川导演的《王的盛宴》都将在11月29日上映。除了影片本身的质量外，也是华谊兄弟与星美两家制片公司之间的博弈。

此前，因为发行方与院线方的分歧，包括华谊、星美在内的五大发行公司联手组成“复仇者联盟”，要提高2%的分账比例，此事在院线的一致反对后也呈现胶着状态。

不过，在昨日《一九四二》通过发布会率先宣布将与30家院线组成的“守护者联盟”签约，并宣布，《一九四二》分成比例将按照3亿票房之内发行方43%与院线57%进行，超过3亿元票房部分将按照45%比55%进行，超过8亿元票房按照47%比53%进行。

这一行为被视为“背叛”，随即，《王的盛宴》的出品方也是发行方星美老总覃宏通过其个人微博宣布，《王的盛宴》也将与院线签约并已达成分账比例：首周43%；次周：41%；再次周：39%直至下片。希望以此保住排片。

刘震云、张国立

演员集体节食饿花眼

《对话冯小刚》

希望观众通过电影思考我们的民族性

“1942年给我的印象是，中国在那个时候是非常的落后、贫穷、积弱。而且正是抗日战争最严酷的一个阶段。”

——导演冯小刚

记者：今年是《一九四二》故事发生的第70年，您自己筹备了近20年，是什么让您坚持把这个作品拍出来？

冯小刚：电影的一个核心的价值，就是通过这个小说、这段历史，让我重新去想我们的民族性是什么样的，我们是从哪来的。观众通过影片对民族发生的灾难，以及人们在灾难中的表现有一个了解，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希望观众通过电影对民族性有一个接近真实的认识，这对未来的生活很重要。希望年轻人能够静下心来在电影院看这个电影，我相信对他们会有非常深的触动。河南几千万人向陕西逃荒，途中几百万人饿死。这是什么概念？

你可能对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屠杀犹太人有一个了解，它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也让很多的德国人开始反省这段历史。那我们饿死这么多人，却很少被人提起，甚至有人根本就不知道发生过这样的浩劫。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电影是非常有价值的。

记者：对于年轻观众来讲，您认为他们会理解您想传达的观念么？会有距离么？

冯小刚：我们做了一些试映，各个年龄段，每次60人，里面可能有20%或者30%是年轻人。通过这几次试映，我发现触动最大的是年轻人。他们觉得非常吃惊，完全不能想象70年前中国人生活是那样的。所以很多年轻人看完了之后说，对他们认识历史、认识民族有很大帮助。看完电影之后他们会反省。

温故知新，温故的目的是为了知新，所以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比如说俄罗斯这个民族是饱经灾难的，包括二战对于他们民族也有重创。但是我发现我们和他们有一点不同，俄罗斯这个民族会通过灾难磨练出一种救赎的主题，我们有时候在灾难中就是磨出奴性。其实我是希望大家能在看电影的时候，除了动人的故事，还能引起一些思考。

记者：《一九四二》拍得非常克制，为什么这么拍？《唐山大地震》的时候被批评过煽情，有没有产生影响？

冯小刚：任何一种方式都是题材决定的。1942年的逃荒，不是地震那种瞬间的东西，很长一段时间在路上走。灾民每天都看

到路上有人死，所有人的感情都很粗糙很麻木，所以就用了这样的方式来表现。

记者：《一九四二》拍得很累，之后还有新的打算吗？个人体力精力还能负荷么？

冯小刚：有逃避的想法，太累了，想拍点比较轻松的电影。最近这两年，我经常是两年拍一个。《唐山大地震》和这个都是用两年拍的。我依然觉得很累。像两个高墙，故官那种。我在高墙中间的巷子里长跑，看不到终点。但越跑感觉越狭窄。

创作人员的根应该吸收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但一个接一个地拍导致你生活很单一，你接触的事情太少了，这样拍就让你口干舌燥，让你过去积蓄的东西都没了，让你每弄一个剧本都很费劲。要从窄巷里走出去，让自己视野开阔一点，让自己生活丰富起来，再回来，放到电影里，才好一些。

记者：19年终于拍完了《一九四二》，这是您最好的电影吗？

冯小刚：我没法这么说，我拍得很用心，这个电影准备时间最长，拍得很辛苦，是最在乎的一个电影，是否最好的电影还得观众去评价。

《对话阿德里安·布罗迪》

这是一个中国的“失去和痛苦的故事”

“温故而知新或许是我们对那些岁月最深刻的致敬。”

——奥斯卡影帝阿德里安·布罗迪（在《一九四二》里演美国记者白修德）

记者：接拍这个戏时，是否知道这段历史？

布罗迪：看剧本时，我只有点浅显的了解，但拍电影很有意思的地方，拍的过程中我就了解很多。我庆幸现在是2012年，大多数人不用担心战争的恐惧，更不用发愁吃饭的问题。在这样安逸的年代，人们更应该该以好的方式去讲述曾经的故事，借此窥见人性的脆弱并避免让糟糕的历史重演。

记者：导演训练演员就是饿他们，您是怎么接近角色？

布罗迪：我的角色和张国立的老东家不是一条线。所以灾民一定要那么饥饿。但我这个角色没有那么大的身体上的改变，我这个戏不用减肥那么多。拍《钢琴师》时，倒是需要把身体从健康调整到亚健康。

记者：您和很多大导演合作过，与冯小刚合作有什么不一样？

布罗迪：是一次独特的令人振奋的经历。每天结束辛勤工作之后，冯先生会抽时间与他的核心团队和主要演员一起吃饭。我演过30多部影片，从来没有一个导演每天晚上会抽时间和演员吃饭的。

记者：您觉得电影里最让您震撼的地方是什么？

布罗迪：对我来说，该片讲的是个很长的、痛苦的过程。从开始到影片结束，我想我挑不出哪一场戏是最震撼的，但我觉得这种感觉堆积起来才比较震撼。

记者：奥斯卡影帝做配角，您觉得吸引来演这个角色的原因是什么？

布罗迪：我对新体验都很感兴趣，每个电影都是学习过程，我对中国历史也有兴趣，也关注冯小刚，我跟中国演员合作也感到很荣幸，他们给我的帮助也很大。

1942不是白修德的故事，这是个群戏，

是中国的“失去和痛苦的故事”。我帮助大家完成这个故事，已经很开心了。

记者：在片场拿笔记，是好莱坞就有的习惯，还是拍《一九四二》特有的？

布罗迪：这是我专门为这个戏养成的习惯，能帮我进入角色。记者一直是观察者，笔记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记者：对中国剧组是否习惯？花了多少时间来适应？

布罗迪：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海外工作，所以对不同的地方的剧组都有涉猎。印度、澳洲、新西兰都有。这次的中国剧组很专业。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这次有很多群众演员，转场拍逃荒，天气又很冷，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冯小刚对群众演员的关心。很多导演不关心群众演员是否舒服，但冯小刚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经常替大家着想。